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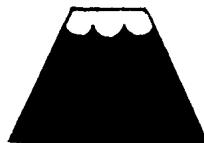
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

中国日本史学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评传

中国日本史学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香河延福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75印张 2插页 306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

ISBN7—201—00065—9/K·12

定 价：4.65 元

序

着手组编这本书，是在1982年夏天。那一年七月，中国日本史学会在沈阳召开第二届学术年会，有人探询性地问我，能否组编一部反映我国日本史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性著作，并提出撰稿者拟以中年骨干研究者为主。会议间隙，我与有关学者，认真地商议了此事，大家的积极性甚高。大家认为，要写就写日本史中我国学者尚未涉及的课题，一可以促使我国日本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二可以充实目前高等学校的日本史教学内容。符合上述要求的课题是什么呢？多数人认为，目前我们最薄弱的是历史人物的研究，因此，首先应齐心协力编撰一部日本历史风云人物论集。当时商定，入选的历史人物，应以三个条件为准，即这些人物，大多是日本历史转折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大多是我国学者尚无专文探讨过的；日本史学界有争议的人物。根据上述标准，初步拟定了二十七个人物，并约定在适当的时期，再召开一次有关人物评价的小型座谈会。1984年10月，中国日本史学会在重庆北碚，召开了“日本历史人物评价学术讨论会”。会议对撰稿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以及对某些难度较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了热烈的议论。在这次会上，经过筛选，确定二十二篇文章，并要求根据会议精神，对已成文稿再作一次修改。1985年底，文稿相继汇齐。承出版社委托，由我和吕万和先生，分别对古代部分和近

代部分的文稿进行审读。囿于全书字数的限制，在不影响作者的观点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在文字上删繁存精，略作压缩。

我通读二十二篇文稿后，心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因为，它们确实反映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新水平。我认为它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这是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的结晶。历史是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多采而生动的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的活动组成的。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讲历史，除干巴巴的结论外，不讲或很少讲人的创造和活动。在日本史研究中，人们虽然认为加强人物研究，是提高研究水平和教学质量极为重要的一环，可是，对那些有争议的，就涉及得很少了。读者如翻开本书目录，便可看到不少人物，如近卫文麿、山本五十六、乃木希典等，要是在过去，谁也不敢去探讨，更不会行文公诸于世的。然而现在不但研究了，而且还把自己的研究结果书写成文，这不是很发人欣喜的事吗！

第二，填补了日本史研究的空白。解放以来，我国的日本史研究，比之于解放前，是有了明显的发展，学者们写出了一批有见解的论文。但从总体上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侵华战争等问题上，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研究甚少，形成了空白。比如日本古代史，对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战国分裂以及江户幕府的研究，虽然偶尔也有论文发表，但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又如近代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也属少见。本书通过对源赖朝、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的论述，生动地勾画出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和战国时期分裂、统一的时代背景、历史发展的规律，幕府政治成立和崩溃的原因，以及源赖朝等人的历史作用。又如通过对坂垣退助

的思想和活动的变化，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掀起、发展和衰落。总之，通过主要人物的论述，使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范围更趋扩大了。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后仍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日本史研究中的空白，肯定会被填补的。

第三，在人物的评价上，能够独立思考，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学者的看法。前已叙及，本书中所收的人物，不少是有争议的人物，比如古代史中的楠木正盛、足利尊氏，近代史中的德川庆喜、大杉荣、近卫文麿等。我们的作者在评价这些人物时，不以日本学者的观点为准，唯遵基本史实，力求用辩证的唯物主义观点，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比如古代史中的楠木正盛的评价，自其死后的六百五十年来，一直没有统一过。不同朝代、不同的人对其评价各异，有褒有贬。贬者斥其为“反贼”、“王朝的看家狗”，褒者尊其为“忠臣”、“良将”，甚至祭为“军神”。而本书中楠木正盛一文的作者，分析研究了大量的史实后认为，日本对楠木的截然相反的评价，大多是“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有失公允。”客观的结论应该是“（楠木）正成倒幕有功，保后醍醐（天皇）有过，但人品高尚，军事才能突出，在日本历史上影响较大。”又如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评价也是截然相反的，有的认为他在明治维新中，大政奉还，退出历史舞台是一位为“君国大事决定牺牲一身荣华的、精神辉煌的伟人”，有的则认为他是“出卖了德川幕府的无节操的将军”。本书德川庆喜一文的作者却认为，在明治维新革命中，他站在封建主立场上，采用战争和平的两手进行抵抗，以期最低限度地维持江户幕府的统治，这是应予以批判的。但是，当他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后，便放弃了抵抗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对江户的和平解放和明治维

新的进程起了好的作用，应予以肯定。日本史的研究，固然应该吸取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唯日本学者的观点为准的态度是不值得提倡的。长期以来，日本学者对我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成果，所以不能予以足够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写出一批（不是几篇、几本）有独立见解的论著。近年来，日本学者开始注意我们的日本史研究成果，就是因为我们在发表了一些有独立见解的论著。因此，从这一意义说，依据丰厚的史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日本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基本符合史实的结论，乃是我国日本史学繁荣昌盛的根本途径。

第四，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研究推向纵深。明治维新是我国学者研究人数最多，发表论著最多的课题之一。但是，研究主要局限在原因、性质等方面。本书收入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五人，即德川庆喜、高杉晋作、坂本龙马、木户孝允、岩仓具视，占全书所收人物的四分之一。所以这样安排，目的是希望促使明治维新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五个人物，分别属于将军、公卿贵族、中下级武士、知识分子阶层。通过对他们的思想转变，以及在明治维新大转折时期的言行的研究，可以比较深入地揭示出明治维新的必然性，和各个阶层对这场革命的不同的态度。通过对他们的研究，也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明治维新领导层的复杂性和明治维新的不可避免的不彻底性。

我们说这本人物集反映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新水平，但不是说我们的研究已达到精臻精善的程度，就日本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就本书的各篇论文之间，其水平也是不一的。论点和论据，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达到了无

瑕可击的程度。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疏漏和错误。尽管如此，作为起步之作和引玉之砖，说它标志着我国日本史研究又迈出新的一步，也不会言之有过的。

最后，让我代表我国日本史研究者全体同仁，对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王金林

1986年5月于天津

目 录

序	王金林	(1)
评圣德太子	禹硕基	(1)
天武天皇及其历史地位	赵连泰	(13)
平安时代的通儒菅原道真	吴 杰	(23)
试论源赖朝	王金林 刘 迅	(46)
评楠木正成	张玉祥	(69)
简论室町幕府创始人足利尊氏	陈相武	(86)
织田信长与日本中世末期的统一	童云扬	(96)
试论丰臣秀吉的历史功绩	王家骅	(122)
武士知识分子新井白石	赵宝库	(146)
论林罗山的思想	李威周	(166)
德川庆喜论	周维宏 武安隆	(190)
倒幕狂飙高杉晋作	宋成有	(208)
坂本龙马与倒幕维新	汤重南	(234)
木户孝允的历程		
——兼论他是否开明	王继麟	(258)
开明派公卿的典型代表岩仓具视	韩文娟	(275)
自由民权运动中的板垣退助	沈才彬	(293)
论西园寺公望的政治作用	刘天纯	(313)

- 论大杉荣 易显石(333)
论德田球 杨孝臣(349)
山本五十六评传 吕万和(367)
试论近卫文麿和近卫内阁 廖隆幹(390)
“军神”乃木希典的真面目 李树藩 骆兆伦(413)

评 圣 德 太 子

禹 硕 基

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原名厩户，又称丰聰耳、上官，圣德太子是溢号。他是古代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摄政期间，为适应国内外风云变化的新形势，他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自古以来，日本人尊奉他为法皇（佛法之皇）、圣王、圣人、伟人等等。学术界对他的普遍评价是：日本佛教的始祖和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今天，太子的肖像印在五千日元和一万日元的纸币上，可见日本人对他的敬慕之心。但也有贬斥圣德太子的。江户时代的国学者抨击太子以佛教取代日本人传统信仰的神。朱子学家非难太子默认了苏我马子诛杀崇峻天皇。自昭和初期兴起批判日本史籍的学风以来，有的学者否认史书中有关太子事绩的一些记载，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圣德太子呢？本文拟作粗浅的评论，不当之处，请指正。

积极摄取中国先进文化的 开明的政治思想家

圣德太子生于公元574年（敏达三年），其父为用明天皇（585—587年在位），母为穴穗部间人皇后。593年（推古元

年) 麟户皇子二十岁时，被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麟户皇子的姑母)立为皇太子，委以摄政。

太子自幼聪明好学，深受大陆移民的宗教和文化熏染。鞍作氏是在日本传播佛教而著名的大陆移民，与苏我氏和圣德太子一家的关系相当密切。其氏姓为鞍部，世代以制鞍为业，始祖为司马达等(止)。达等是中国人的后裔^[1]，大约在六世纪中叶东渡日本^[2]。他笃信佛教，据传曾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筑草堂，安置本尊，归依礼拜。在崇佛派大臣苏我马子和排佛派大连物部守屋相争之际，他站在马子的一边。584年(敏达十三年)达等奉马子之命到各地求修行者，在播磨国找到还俗的高丽僧惠便。达等的女儿司马嶋从惠便出家，号善信尼。善信尼于588年(崇峻元年)，被派往百济学习戒律。达等之子多须奈也是佛教的归依者，圣德太子之父用明天皇病危时，他为祈愿天皇痊愈，出家称德齐法师，修造六丈佛像。多须奈之子止利佛师(鞍作鸟)是制作飞鸟寺和法隆寺的本尊而闻名的雕塑佛像的名匠。止利佛师雕塑的法隆寺释迦三尊像的背光铭文祈求病中的圣德太子及其妃膳郎女康复。606年(推古十四年)，太子嘉奖达等以来三代兴隆佛教之功绩，授予止利佛师大仁之冠位，赠近江坂田地方的水田二十町。止利佛师的造佛技法，被称为止利式，在飞鸟时代很有影响。

如上所述，鞍作氏世代崇信佛教，与太子一家的关系很好。由此可以推测，太子幼年时主要通过鞍作氏接受了教理深奥的佛教和大陆的先进文化。太子十四岁时，已经作为崇佛者，参加了苏我马子打倒物部守屋的战斗。

苏我马子打倒物部守屋的第二年，即588年(崇峻元年)，百济向日本朝廷派遣数名僧侣。这时因崇佛派马子在朝廷掌握

实权，来日的僧侣受到朝廷的重视。尽管史籍没有记载太子向他们学习佛经，但受大陆移民的熏陶，崇信佛教的太子，向百济僧侣学习佛典是可以想见的。

《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习内教于高（句）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3]内教指佛教经论，外典指中国典籍。惠慈是高句丽名僧，于595年（推古三年）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来到日本，615年（推古二十三年）归国，在日本滞留二十年。他住在飞鸟寺，是当时日本佛法的栋梁之一。据僧仙觉的《万叶集注释》中引用的《伊予风土记》逸文载，惠慈来到日本的第二年十月，太子曾和惠慈逍遙于伊予温泉。可见太子对惠慈的敬重和两者的亲密关系。《上官圣德法王帝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官御制疏，太子所问之义，师有所不通，太子夜梦见金人来教不解之义，太子寤后即解之，乃以传于师，师亦领解，如是之事，非一二耳。”^[4]这段文字说明太子撰写《三经义疏》时，曾请教于惠慈。惠慈回国时带去《三经义疏》传播于本国。太子摄政以后，以惠慈为师深入学习和钻研佛经，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和佛教的积极倡导者。

圣德太子学习中国典籍于博士觉哿。博士指五经博士，是教授《易》、《尚书》、《诗》、《礼》、《春秋》五经的学者，但他们一般还传授其他文化知识。自继体朝（507—531年）以来，百济轮流派遣五经博士，在日本传授儒家经典和其他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学者分析，觉哿可能是由百济来到日本的。^[5]他何时来日，何时归国不详。圣德太子以觉哿为师，学习了儒家思想，成了儒教的信仰者。

综上所述，圣德太子通过大陆移民和百济、高句丽的僧侣，学习佛教经论，又学儒家经典于五经博士，成为信仰儒、

佛二教的开明的思想家。由于僧侣和五经博士不仅通晓佛、儒二教，又往往兼有其他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太子通过他们摄取了广泛的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

圣德太子不仅本身热心汲取大陆先进文化，在他摄政期间，还积极组织人员向来日的朝鲜僧侣、艺人学习各方面的先进知识，以提高日本的文化。602年（推古十年），百济僧观勒来到日本。他带来历法、天文、地理、遁甲、方术之书，太子选派书生阳胡史祖玉陈、大友村主高聰、山背臣日立分别向他学习历法、天文和遁甲、方术，这些学生皆学以成业。610年（推古十八年），高句丽派来僧昙征。他通五经，又会制造染料、纸、墨以及碾硙，为日本文化和生产力的发展作出贡献。612年（推古二十年），百济人味摩之来日本，他曾学伎乐于吴国。太子把味摩之安置在樱井，集中少年向他学习伎乐。

太子恢复和发展了中日邦交，向隋朝派遣留学生，积极移植中国的先进文化。600年（推古八年），太子遣使通好于中国隋朝，恢复了五世纪末以来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607年（推古十五年），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翌年，妹子归国时隋朝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裴世清回国时，太子再次派遣妹子赴隋。614年（推古二十二年），又遣犬上君御田锹使隋。关于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隋书·倭国传》写道：“闻海西菩萨天子望兴佛法，故遣朝拜。”表明是求佛法而来，但求佛法并非唯一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广泛摄取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一点我们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小野妹子第二次使隋时不仅派去僧旻、南渊请安等四名学问僧，而且还派去高向玄理等四名学生。遣小野妹子第二次出使隋朝，一是为陪送隋朝使者；二是为了派去留学生。向隋朝派遣留学生是移植

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而又开明的政策，是圣德太子的伟大创举。这种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平安时期。遣唐留学生就是继承了遣隋留学生的形式。太子派遣的留学生尽管数量不多，但他们是从大陆移民的后裔中精选出来的通晓汉文的优秀人材。这些学生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6〕}历经隋、唐两代，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文物制度，归国后积极传播，为日本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僧旻和高向玄理在大化革新中作为新政权的政治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子在对隋外交上，改变了过去向中国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立场，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向炀帝递交的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6〕}隋炀帝阅后不悦，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7〕}但由于国际斗争的需要，却款待了日本使者，小野妹子回国时派遣裴世清陪送至日本。当时炀帝正准备征伐高句丽，为了牵制高句丽，有必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太子却利用这种形势，同隋朝建立了对等外交关系。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时带去的国书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8〕}坚持了对等的立场。圣德太子一面向中国摄取先进文化，一面同隋朝建立平起平坐的外交关系，不仅发展了本国文化，又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由于圣德太子思想开明，采取移植大陆文化的积极措施，日本的思想和语言文字、建筑、雕刻、美术、音乐都有了很大发展。灿烂的飞鸟文化，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的文化发展状况。

以儒、佛二教为指导思想，致力于解救社会危机，整饬统治秩序的著名改革家

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是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国隋朝统一了国土之后，大举征伐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新罗崛起，将领土扩大到汉江流域。国内部民制^[9]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引起社会危机，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凋蔽，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德太子为了挽救社会危机，整饬统治秩序，提高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603年（推古十一年）（阴）十二月，制定冠位十二阶。十二阶冠位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冠位的名称采用儒家的德目，这是为了以儒家思想教化贵族。冠位以冠表示，冠以不同染色的缠制成。冠位是朝廷授予贵族的位阶，它和氏姓制^[10]下的姓不同。姓是按血统和职务，由天皇授予氏之首领氏上的表示身份尊卑的称号，而冠位则按才能和功绩授予个人，不问姓的高低，因此在氏姓制下，身份低下的贵族也可以受较高的冠位。例如，前面提到的止利佛师是身份低微的大陆移民，但由于崇佛和造佛之功受第三位的冠位大仁。姓可以世袭，冠位则不能，可按功劳或才能晋升。如小野妹子第一次赴隋时的冠位是大礼，后因两次使隋之功受最高冠位大德。圣德太子的近侍者秦川胜因造四天王寺受大仁之冠位，后由于修造峰岳宫之功，被晋升为小德。冠位制的这些原则有利于擢拔有才能的人材。

冠位制的实施削弱了氏姓制，降低了门阀贵族的地位，增强了皇权，推进了官僚体制的建立。制定冠位制时，并没有废

除氏姓制，但朝廷不按姓的尊卑，授予贵族不可世袭的冠位，无疑对氏姓制是个打击。随着受位者的增加，门阀贵族的势力相对下降，天皇的权力相对提高是必然的。

冠位制促进了已经萌芽的贵族的官僚化和官僚体制的建立。当时朝廷已有国政参议官大夫，在一些地方实行了国、县的行政体制。^{〔11〕} 冠位制为建立官位制打下了基础。官位制是位阶与官职相对应，即以官、位相当为原则。位阶制是官位制的前提条件。

冠位制的实施范围比较窄，从授予冠位的实际情况来看，仅仅局限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与朝廷有关系的中小贵族中间，授予其他地方贵族的例子不多见。因此，它所起的作用是很有有限的。

604年（推古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采用了训诫的形式，没有规定对违者的制裁条款，所以不是如今意义上的宪法。《宪法》的条款大都出自中国的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经典和佛教思想，而尤其直接引用和参照儒家典籍的居多。

《宪法》规定“君则天之，臣则地之”（第三条），“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十二条）。这些条款是针对当时氏姓贵族以氏为单位独立为政，门阀贵族权倾朝野，皇权衰微，不断发生下克上等现象而提出来的。它旨在提高天皇的地位，抑制门阀贵族的势力。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的提出，从思想上提高了天皇的地位，给贵族们留下了尊王思想的烙印，为后来大化革新中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宪法》又提出“以和为贵，……上和下睦”（第一条），